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代际传承

周 皓

【摘 要】文章利用“人口迁移与儿童发展的跟踪研究”数据,从状态与变动两个方面,讨论了社会融合在代际间的传承问题,以及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融合在代际间具有传承性,充分的亲子交流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发展;控制家庭背景后,学校效应依然显著。结论认为,社会融合不仅具有代际的传承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传承结果决定了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起点,而亲子交流决定其方向和速度。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家庭环境建设与家庭教育方式的改进。

【关键词】流动儿童 社会融合 代际 亲子交流 跟踪调查

【作 者】周 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问题已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在现有的研究中,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外的其他家庭因素都被忽略了。如家长的社会融合状况是否会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即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变化是否会存在代际传承?亲子交流会促进儿童心理健康,那么它是否会影响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在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家庭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与回答。本文试图利用跟踪调查数据,讨论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代际传承问题,以期改善与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提供理论支持。

一、研究述评

“社会融合”是指迁入(或流入)人口在迁入地逐步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并最终形成相互认可、相互“渗透、交融、互惠、互补”。当前的相关研究中,从理论背景、理论框架建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定义,到研究内容等都呈现出多元化状态。这也正说明它是“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张文宏、雷开春,2008)。

从理论上来看,Gans(1974)和 Sandberg(1974)在 Warner 等(1945)的基础上提出的直线融合,以及根据反对意见(Glazer 等,1970;Greeley,1977;Conzen 等,1992)而提出的修订模型“种族划分的曲线理论”(Gans,1992)认为,族群划分的代际动态是存在的,且会朝着融合的一般方向发展。区隔融合理论则认为移民群体可以保持自身的文化特征(即迁出地/迁出国的文化背景);且最终的社会融合可以有多种结果,既可以是向上的社会流动,也可以是向下的社会流动;而且这种社会流动的结果既与移民自身的社会融合起点(或其自身的社会

经济地位)有着较强的联系,同时也与迁入地社会本身的社会分层有关(Portes等,1993;Zhou,1997a、1997b)。显然,这两个理论都只讨论了代际差异和子代的社会融合方向,却忽视了代际的传承与联系,也忽略了二代移民(或移民后代)社会融合状况的起点。

从国内的实证研究来看,成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受到制度性障碍、人力资本(特别是受教育状况)、社会资本及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王春光,2001;李强,2004;刘传江、周玲,2004;钱文荣、张忠明,2006;王桂新、王利民,2008)。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研究则强调社会环境(如学校环境、同伴关系)与社会制度(史晓浩、王毅杰,2010),却忽视了家庭环境的重要性,也忽视了流动儿童父母自身的社会适应状况(辜美惜等,2010)。尽管父代与子代在社会融合状况上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但典型相关分析无法检验这种因果关系,因此也无法说明社会融合的代际传承性。

心理学研究通常只考察儿童的心理健康或社会适应等的研究,并强调父母亲的教育(教养)方式、亲子交流程度、家庭环境等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郭良春等,2005;郝晓康、李新宇,2006;申继亮、王兴华,2006;申继亮等,2007;辜美惜等,2010),却忽视了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的重要性。诚然,心理健康是社会融合的一个维度,但并不是社会融合的全部。

对于流动儿童而言,他们尚未真正接触各种社会制度(尽管生活在这些社会制度之下),也就无法体会各种制度的限制,也无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可言。在他们的社会网络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家庭环境与学校或社区环境。这是他们能够直接体验与感受到、并具有影响作用的社会环境。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环境。其状况及变化会直接影响流动儿童对迁入地社会的认知与接受程度,进而影响到社会融合状况及变化。但在人口学、社会学视角下的流动儿童研究中,通常会忽略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外的其他家庭因素的作用,而将流动儿童的弱势归因于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而心理学尽管强调了家庭环境与家庭教育,却忽视了社会制度,也忽视了家长的社会融合状况对儿童的影响作用。诚然,不同的研究内容及其归因的侧重点来源于学科的差异。但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却是多维的,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一个方面或单因素的作用结果。同时,受制于研究设计与调查方法,目前的研究无法描述、分析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的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也无法体现社会融合的动态性。因此,理论上的割裂、归因不全及动态性研究的缺乏,使我们必须要在建立统一、完善的理论框架与操作化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

二、研究假设

家庭作为儿童成长和社会化的基础环境,不论是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学业成就,还是对其社会融合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希望探讨社会融合在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承问题,即家长的社会融合状况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变动的的影响作用。家长的社会融合状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其社会态度,进而影响儿童的社会态度。因此本文的第一个

假设是:父母亲较好的社会融合状况有助于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

以往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表明,家长与流动儿童之间的亲子交流情况和流动儿童的同伴关系对于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孤独感与抑郁感)有显著影响。如果家长与子女之间的亲子交流越多、沟通越充分,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也相对越好。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更多的亲子交流有助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

以往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就读于不同学校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存在显著差异,那么,产生这种差异的真正原因是否在于学校?或者说,控制了流动儿童的家庭背景后,如果两类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合上的差异不再存在。这就说明产生流动儿童社会融合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而不是学校;但如果所得到的结果相反,即不同学校类型中的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合上的差异并没有因为控制了家庭背景而得到完全解释,那么,除家庭背景与个体特征外,学校也是导致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我们仍然无法将未解释的差异全部归因于学校。因此,本文第三个假设是:就读的学校类型会影响两类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

三、数据、变量选择与描述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人口迁移与儿童发展的跟踪研究”(PSDMC)。该调查分别于2006年10~11月、2007年5月和2007年11月进行了三轮跟踪调查。基期调查时以班级为基本抽样单位,采用系统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后期采用跟踪班级的方法。每一轮的实际调查人数分别为:1359人、1275人和1315人;其中流动儿童的样本规模分别为:1039、957和977人。

调查公立学校以班级为基本抽样单位(PSU),采用系统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先从所有公立学校的三年级中抽取12个班级(对应12所学校);然后,在所抽中的学校中,随机抽取五年级的1个班。即在所抽中的学校中,仅调查三年级和五年级各1个班。而流动儿童学校(7所)则由于数量相对较少而全部抽取。在每所流动儿童学校中根据随机数表随机抽取三年级和五年级各1个班。被抽选班级中的所有学生即为本次调查的样本。第二轮调查与第三轮调查均未改变其班级,而直接对基期调查中抽中的班级中的所有学生进行调查。

(二) 变量选择

由于在建构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综合指标时^①,已经将部分相关的变量纳入到变量的构建过程中,如流动儿童在迁入地居住的时间、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和用于表示结构融合的居

① 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5个维度。对于流动儿童而言,除了第一个维度经济融合不适用以外,其他4个维度都是适用的。其中,文化适应操作化为语言和居住时长;社会适应主要指心理与观念,操作化定义为:是否喜欢北京、是否担心有人看不起你、是否觉得有人看不起你和孤独感。结构融合操作化定义为:(1)你是否喜欢北京人;(2)朋友圈;(3)居住社区的类型;(4)是否会说老家话;(5)是否回过老家。身份认同操作化定义为“你觉得自己是北京人吗?”,以从主观的角度来看流动儿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情况。

住社区等,因此,流动儿童个体特征的变量为年龄、性别和年级(事实上年级同样也可以理解为队列)。流动儿童就读学校的性质则作为学校环境的变量,尽管这一变量被赋予了太多的信息。同时,考虑到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不仅受个体因素的影响,还受学生自身的学习成绩和心理状况的影响。因此,模型中还将加入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与心理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家庭背景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家长的个人特征,选取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在一般的家庭或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一般总是包括教育、收入与职业3个方面。但是从本调查的数据来看,职业分类设计得不好,只能摒弃^①。二是家长社会融合指标的构建。经济方面选用住房及家庭收入来测量。文化适应选用语言(平时在家说哪里的话)和居住时长这两个变量。社会适应因素选用是否喜欢北京、对农村的看法,以及“您觉得北京人对外地人和北京人是否有区别”3个变量,前两个是受访者个体对社会与环境的感知,而第三个变量则用于说明流动人口是否感受到歧视。结构融合因素包括了两个方面:在迁入地的社会交往结构和与老家的联系;前者用居住的社区、是否喜欢北京人、和朋友圈3个变量来测量,以表示拉力,后者用老家是否还有土地和老家是否还有亲人这两个变量来测量,以表示推力。身份认同,将利用“您觉得自己是北京人吗”和今后在北京的居留意愿这两个变量来测量。从模型的角度考虑,众多的变量势必会降低统计效率,也不利于后续研究,因此,本研究利用二阶因子分析将家长的社会融合组合成一个综合指标加入到模型中。三是亲子交流。在数据处理中发现父母亲评价的亲子交流情况与子女的评价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其原因可能是家长与儿童有不同的关注焦点。由于本文讨论的是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因此应该以儿童自己的体验为标准,而不是父母亲所认为的亲子交流情况。但由于它属于父母亲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将这一变量归入到家庭背景。这一变量同样由多个问题构成。具体计算方法是:先对每个问题、每个选项进行赋值(介于0和1之间);然后将各问题得分相加,即为亲子交流的得分^②。上述需要纳入模型的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分析结果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从状态与变动两个方面考察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利用相同的变量建立两种不同的模型。即模型一以每一轮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线性回归方法,考察不同时点上各种因素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的影响。模型二则以三轮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讨论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变动的影响因素。前者讨论状态,后者关注变动。

(一) 抽样设计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考虑抽样方法,而直接利用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或加权后的数

^① 为使模型简约,并避免多重因果关系问题,本文模型中未加入可能影响家长社会融合的家庭背景其他变量(如居住环境、时间等)。

^② 计算过程参见 www.psdmc.net。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类别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均值	标准差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样本
因变量									
社会融合	0.000	0.8994	1037	0.0000	1.004	957	0.000	0.9974	977
儿童特征									
年龄	9.6218	1.4132	1034	10.6084	1.4325	955	10.6701	1.4689	975
性别	0.5602	0.4966	1039	0.5528	0.4975	957	0.5455	0.4982	977
年级	0.4937	0.5002	1039	0.4869	0.5000	957	0.5455	0.4982	977
抑郁感	1.4199	0.2641	1037	1.4081	0.2817	954	1.3824	0.2887	977
成绩	-0.0281	0.9706	1031	-0.0329	0.9675	934	-0.0150	0.9673	961
家庭背景									
母亲受教育	8.5238	2.7227	1039	8.5647	2.7176	957	8.4999	2.7908	977
父亲受教育	9.4181	2.3046	1039	9.5193	2.2887	957	9.4459	2.2668	977
家庭收入	1361.938	1080.167	1039	1460.569	1093.62	957	1421.466	1171.934	977
社会融合									
综合得分	0.0098	0.5495	910	0.0041	0.5808	832	-0.0009	0.5817	891
亲子交流									
亲子交流	3.7546	1.5170	1023	2.9065	1.2263	936	3.9264	1.6684	931

注:学习成绩用的是总成绩。

据)来进行分析。但是,不同的抽样方法会得到不同的抽样方差,从而具有完全不同的设计效果。如整群抽样会使抽样方差扩大,从而使回归系数的标准误随之扩大。在相同回归系数的情况下,标准误越大,对应的t值会越小,从而有可能会使变量显得不显著。而分层抽样则正好相反。本调查是按照分层、整群抽样来进行的。即首先按照公立学校与流动儿童学校这两个层分别抽取;然后再按照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班级。在这种抽样方法中,前者会使抽样方差缩小,而后者会使抽样方差扩大,以致无法判断这种抽样过程可能会对最终回归结果的判断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最佳的方法是应用复杂抽样数据分析方法,以剔除抽样方差的影响,进而真正反映现实的情况。

表2给出了相同数据、相同变量情况下,复杂抽样数据分析方法的结果和以加权数据为基础的分析结果。两个方程具有相同的回归系数。但由于标准误估计方法不同^①,回归系数标准误的估计值不同,进而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最显著的是年级变量。在一般回归分析中,年级变量的标准误为0.0897,而复杂抽样数据分析的结果则为0.1343。在相同的回归系数之下,由于标准误不同而得到完全不同的t值(2.43和1.63)。前者所对应的显著度为0.015,说明各年级之间存在差异;而后者所对应的显著度则为0.113,已大于0.05的水平而不显著,说明各年级之间并不存在差异。在相同数据、相同变量的情况下,两种方法得到的

① 具体计算方法请参见 Steven G. Heeringa etc. Applied Survey Data Analysis(Draft Manuscript) 2009。

结论是完全相反的。这一例子充分说明,如果直接利用调查数据,而不考虑抽样方法的影响,那么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是有偏的,因此本文其后的分析均采用复杂抽样数据分析方法。需要提醒的是,考虑权重只能解决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抽样设计引起的抽样方差膨胀或缩小的问题。

表 2 复杂抽样数据分析结果与一般回归结果的比较

	Svy 回归结果				一般回归的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值	Sig.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值	Sig.
是否流动儿童	0.3453	0.0894	3.86	0.000	0.3453	0.0520	6.64	0.000
性别	-0.0666	0.0392	-1.70	0.098	-0.0666	0.0522	-1.28	0.202
年龄	0.0698	0.0328	2.13	0.040	0.0698	0.0293	2.38	0.017
年级	0.2182	0.1343	1.63	0.113	0.2182	0.0897	2.43	0.015
学习成绩	0.0567	0.0324	1.75	0.088	0.0567	0.0327	1.73	0.083
抑郁感	0.9445	0.1458	6.48	0.000	0.9445	0.1036	9.11	0.000
常数项	-2.2780	0.3425	-6.65	0.000	-2.2780	0.2807	-8.12	0.000

(二) 模型一:按照横截面数据处理的结果

利用第一轮调查数据得到的模型一结果如表 3 所示。该模型总共包括 4 个嵌套方程:方程 1 只纳入流动儿童的个人特征;方程 2 在方程 1 的基础上,纳入家庭背景的变量(包括收入与教育);方程 3 在方程 2 的基础上,再纳入父母亲的社会融合指标;方程 4 则再纳入亲子交流的情况。限于篇幅,仅对第一轮调查数据列出了上述 4 个方程;而第二、三轮的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则仅列出最终方程(分别对应的方程 5 和方程 6)。

将其他变量理解为控制变量,本文更关注对应于理论假设的变量,即是否为流动儿童(即学校性质)、父母亲的社会融合与亲子交流。首先,公立流动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在社会融合上的差异并没有因为控制家庭背景与其他变量而得以消除,仍然是显著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下降(即从方程 1 的 0.3094 下降为方程 4 的 0.2633)。相对而言,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会更好,即便是在家庭背景与个体特征相同的情况下。这说明学校环境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父母亲的社会融合状况对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父母亲的融合状况越好,则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也越好。再次,亲子交流则会促进社会融合。亲子交流越好,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也越好。而亲子交流的影响作用与父母亲的其他因素(如收入或受教育水平等)无关。

第二轮与第三轮调查的分析结果结果是相同的。由此,待检验的理论假设得到部分证明。即家长的社会融合和亲子交流都会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且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类型会影响到其社会融合状况。

(三) 模型二: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

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是以儿童个体作为组单元,还是以时间作为组单元。这就取决于研究的目的。事实上,如果将儿童个体视为组单元,组内则是每个儿童在 3 个时点

表3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一)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方程 6
常数项	2.5707*** (0.3408)	2.5261*** (0.3475)	2.4533*** (0.3937)	2.6573*** (0.4106)	3.3592*** (0.2947)	3.3942*** (0.4939)
流动儿童(R=公立流动)	-0.3094*** (0.0841)	-0.2978*** (0.0797)	-0.2948*** (0.0760)	-0.2633** (0.0770)	-0.3957** (0.1222)	-0.4252*** (0.1140)
性别(R=女)	0.0707 (0.0473)	0.0706 (0.0455)	0.0680 (0.0447)	0.0763 (0.0561)	0.0191 (0.0610)	0.0199 (0.0470)
年级(R=3)	-0.1604 (0.1444)	-0.1709 (0.1422)	-0.0969 (0.1338)	-0.0363 (0.1358)	0.1190 (0.1354)	0.2683* (0.1226)
年龄	-0.0766* (0.0363)	-0.0716+ (0.0363)	-0.1017** (0.0332)	-0.1224** (0.0379)	-0.1364*** (0.0330)	-0.0894* (0.0364)
成绩	-0.0029 (0.0024)	-0.0031 (0.0025)	-0.0030 (0.0024)	-0.0038 (0.0026)	-0.0014 (0.0023)	-0.0025 (0.0020)
抑郁感	-1.0254*** (0.1469)	-1.0110*** (0.1466)	-0.9258*** (0.1444)	-0.9647*** (0.1568)	-1.4324*** (0.1227)	-1.7492*** (0.2078)
家庭收入		0.0629+ (0.0327)	0.0573+ (0.0312)	0.0545+ (0.0308)	0.0131 (0.0242)	0.0443+ (0.0238)
父亲受教育		-0.0192 (0.0140)	-0.0199 (0.0129)	-0.0194 (0.0121)	-0.0236 (0.0234)	-0.0098 (0.0221)
母亲受教育		0.0091 (0.0144)	0.0028 (0.0146)	0.0076 (0.0154)	0.0274 (0.0199)	0.0050 (0.0153)
亲子交流			0.0693*** (0.0154)	0.0663*** (0.0150)	0.1092*** (0.0262)	0.0478+ (0.0239)
父母社会融合				0.1203** (0.0400)	0.2488*** (0.0664)	0.1291+ (0.0660)
N	1032	1032	1018	895	816	841
R ²	0.1543	0.1614	0.1838	0.1973	0.3263	0.3889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p<0.10,*p<0.05,**p<0.01,***p<0.001。

上的测量结果;这时不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表4中方程1和方程2中的均值为每个儿童的各个自变量在3个时点上的平均值。其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协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作用是否在每个儿童身上都能成立。但如果将时间点视为组单元,那么,表4中方程3和方程4中的均值则为每个时点上所有儿童的均值,然后再来计算协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大小在三轮时点上的平均;其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协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是否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在解释结果之前,还应该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进行判断,选择更为合理的模型来进行解释。Hausman 检验提供了判断的依据。其原假设为:模型中的个体效应(即随机项部分)与其他回归变量(协变量)不相关。如果两者相关(即 H₀ 假设被拒绝),说明随

表 4 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模型二)

	以个体分组		以时间分组	
	方程 1(固定)	方程 2(随机)	方程 3(固定)	方程 4(随机)
流动儿童				
R=公立流动		-0.5227*** (0.0580)	-0.4979*** (0.0446)	-0.5052*** (0.0446)
性别				
R=女		0.0679 (0.0542)	0.0794* (0.0410)	0.0780* (0.0411)
年级(R=3)		-1.5624** (0.4821)	-1.0167* (0.4326)	-1.0630* (0.4328)
年龄	-0.0901* (0.0502)	-0.1008** (0.0334)	-0.1417*** (0.0329)	-0.1104*** (0.0306)
年龄与年级的交互	0.2691*** (0.0712)	0.1460** (0.0466)	0.1064* (0.0420)	0.1046* (0.0420)
成绩	-0.0710** (0.0255)	-0.0836*** (0.0212)	-0.0968*** (0.0226)	-0.0956*** (0.0226)
抑郁感	-1.0373*** (0.1103)	-1.2651*** (0.0844)	-1.3299*** (0.0835)	-1.3558*** (0.0831)
家庭收入	-0.0115 (0.0358)	0.0282 (0.0287)	0.0498* (0.0289)	0.0530* (0.0288)
父亲受教育		-0.0055 (0.0140)	-0.0112 (0.0107)	-0.0099 (0.0107)
母亲受教育		0.0194* (0.0117)	0.0189* (0.0090)	0.0194* (0.0090)
父母的社会融合	0.0842* (0.0411)	0.1141** (0.0348)	0.1398*** (0.0366)	0.1392*** (0.0366)
亲子交流	0.0398* (0.0163)	0.0513*** (0.0133)	0.0673*** (0.0145)	0.0610*** (0.0137)
常数项	0.8877* (0.4915)	2.5298*** (0.4191)	2.8215*** (0.4008)	2.5560*** (0.3878)
N	1567	1567	1567	1567
R ²	0.1305	sigma_u 0.5234	0.2981	
		sigma_e 0.6038		0.7997
		rho 0.4290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p<0.10,*p<0.05,**p<0.01,***p<0.001。

机效应模型违反了高斯—马尔可夫假设,其估计是有偏的。因此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为此,在报告数据结果之前,先对两个固定/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进行 Hausman 检验。在以儿童个体为组单元的分析(表 4 中方程 1)中,Hausman 检验结果为 $\chi^2(6)=31.77$ (sig.=0.000),拒绝原假设,因此,以儿童个体为组单元的分析应该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而在以时间为组的分析(表 4 中方程 3 和方程 4)中,Hausman 检验结果为 $\chi^2(10)=12.68$ (sig.=0.2422),因此,后者则需要利用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反映的是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的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家长社会融合状况的变化对于因变量的作用在 5%的水平上显著,而且方向为正,这表明,家长的社会融合的变化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变化是一致的。如果在一段时间以内,家长的社会融合变差,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也会变差。反之亦然。而以时间为组单元的随机效应模型反映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三轮调查中的平均作用;也就是这些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在 3 个时点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表 4 中方程 4 的结果表明,父母的社会融合状况对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的影响作用在三轮调查之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而且影响作用的方向仍然是正向的。这说明,在每一个时点上,父母的社会融合状况越好,流动儿童的社

会融合状况也会越好。反之亦然。

这两个模型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反映的是“变化”对于“变化”的影响;而后者则反映的是“状况”对于“状况”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不论是家长社会融合的状况,还是变化,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状况与变化;且方向相同。根据这种分析思路,家庭内的亲子交流情况对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与家长的社会融合完全相同。即亲子交流越充分,越能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而改进亲子交流(即亲子交流的变化)会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向好的方向发展。

另外一个需要检验的假设是:儿童就读的学校类型是否会影响到儿童的社会融合。由于流动儿童的就读学校类型在几轮调查中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学校类型这一变量无法估计,只能看以时间为分组的随机效应模型。表4方程4中,在控制了流动儿童个体特征与家庭背景,以及家长的社会融合和亲子交流等各种源自于个体与家庭内部的因素以后,仍然可以看到公立流动儿童与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合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再次说明学校类型对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存在着显著的影响。

(四) 部分控制变量的解释

除了上述3个研究变量以外,模型中还有几个控制变量可以讨论。首先来看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抑郁感、学习成绩5个变量。其中,性别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不显著。年级变量在模型一中(即各轮调查为独立样本),仅在第三轮调查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年级所表示的两个队列的社会融合状况在前两轮调查中并不存在差异,只是在第三轮调查中,五年级队列才显著好于三年级队列。在模型二中,以儿童个体为组单元的分析,由于队列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未纳入该变量;而在以时间为组单元的分析中,该变量则具显著的负向作用,即从时点的平均状况来看,五年级队列的社会融合状况相对差于三年级。这两个结论似乎是矛盾的。但如果考察两个队列各自的变动情况则会发现,五年级队列是由较低起点向较高水平方向的发展;到第三轮调查时,从总体样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级队列与三年级队列已不存在显著差异了;从跟踪样本的角度来看,则五年级队列明显好于三年级队列。因此,从三轮调查的平均来看,五年级队列相对比三年级的要差;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五年级队列最终会比三年级队列要好。这也就解释了两个模型之间年级这一变量看似矛盾的结果。

年龄这一变量在两个模型中都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年龄越大,社会融合状况越差。但年龄与年级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五年级儿童的年龄肯定要大。因此,年龄的负向作用可以与年级的作用同时考虑。事实上在模型一中试验性地加入年龄与年级的交互项,但交互项在3个模型中均不显著。尽管不显著是有意义的,但考虑到模型的简约,并未列在模型一的结果中。而该交互项在模型二中却是显著的,这说明两点:(1)五年级儿童中年龄越大,其社会融合状况更好;(2)五年级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发展轨迹与三年级儿童是不同的,如果将三年级儿童的发展轨迹看成一条平行于横坐标的回归直线(控制了其他变量后),那么,五

年级儿童的发展轨迹则是另一条具有一定斜率的直线。这也正说明不同年级具有不同的发展轨迹。

抑郁感和学习成绩这两个变量是儿童心理健康与学业成就的具体体现,也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也可以被视为儿童发展的结果。从模型结果来看,抑郁感对社会融合的状况及变动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抑郁感(变得)越强,社会融合状况也就(变得)越差^①。但学习成绩却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从模型一中三轮调查作为独立样本的情况来看,学习成绩与社会融合状况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是,在模型二中,学习成绩与社会融合之间却呈现出负向的关系,即学习成绩越好,其社会融合状况会变差。这一结果很难解释。一般来说,学习成绩越好,那么流动儿童的各方面表现也会越好,社会融合状况也会越好。结果却正相反。正如前面提到的,儿童发展中的心理健康、学业成绩和社会融合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而且这种因果关系对不同人群可能会有不同的效应,需要再进一步的讨论。

其次再看家庭特征。家庭收入、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这3个变量中仅有母亲受教育水平在模型二中有显著的作用;其他情况下都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家庭条件无关,而更重要的是父母亲本身的社会融合状况及亲子交流的情况;另一方面说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尽管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在各时点上尽管没有作用,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化的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跟踪调查数据,从状态和变化两个角度检验了文初提出的3个假设:家长的社会融合、亲子交流和就读学校类型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得到一致的结论:(1)家长的社会融合状况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存在着影响作用;家长的社会融合状况越好,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也就越好。反之亦然。(2)家长社会融合的变化对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变化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家长的社会融合变得越好,同样使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向好的方向发展。反之亦然。这两个结论证明了社会融合在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承性。(3)亲子交流有助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的改变。充分的亲子交流有助于流动儿童提高社会融合的状况,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4)即使是控制了流动儿童的个体特征与家庭背景,就读于不同学校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可以确认的是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受学校因素的影响,即存在学校效应。

不论是社会融合定义中的哪个维度(如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与身份认同等),还是发展轨迹的3个参数,抑或是儿童发展中的其他维度(如心理健康),家庭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上述结论表明社会融合不仅具有代际的传承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① 这里抑郁感的得分值越高,表示抑郁感越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代际的传承可能只决定流动儿童社会融合发展轨迹的起点参数,而亲子交流有助于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说明它能够改变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也说明了社会融合的可塑性。较低的起点,只要有正确的发展方向和一定的发展速度,相信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最终结果也将会更好,从而有助于他们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如果发展方向错误、或者根本就没有变化,甚至于向更差的方向发展,那么,即便起点再高,也无济于事。因此,尽管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环境的优化能够促进家长(即成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并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但我们更应该强调家庭教育,通过促进或改进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理念、方式、手段等)来促进流动儿童的发展,或许这比举办更多的校外辅导班、托管班等要有更好的效果,而且也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强调、甚至归咎于社会制度与社会环境。

本文结论同样说明,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因素以后,不同学校性质的流动儿童之间在社会融合上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就肯定了学校环境在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表明,就读于公立学校就一定会改善或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因为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目前学校效应仅用学校性质(公立学校或流动儿童学校)这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它所包含的信息过多,既可以表示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交往和接触机会,以及由此而来的同伴关系,也可以表示学校的教育方式等;尽管这一指标反映了学校之间的差异,但却无法说明真正的原因。二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两种异质性问题:公立流动儿童与流动儿童在各种背景上的差异(即教育选择性问题),以及学校效应的异质性问题;后者系指转学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所有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有所好转,它对不同的儿童具有不同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以从当前公立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合状况上的分布得到某种验证,即公立流动儿童内部在社会融合状况上同样有着好中差的差别;而上述的分析结果只是针对平均水平而言(这提醒我们需要对其中的差异性进行分析)。

如果将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问题置于儿童发展的视角之下,那么它既是发展所应该包含的内容之一,也是社会态度与风险行为的内在原因;即在由社会背景和家庭因素到儿童发展(学业成就、心理健康、社会融合等),再到以各种风险行为为代表的外在表现这一因果链中,儿童的社会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我们既应该避免国外研究中仅关注于风险行为(或以风险行为来作为社会融合的测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也应该在国内现有基础上扩展研究对象的因果链。只有充分了解、深入分析与正确解释这3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因果关系,才能有助于政策的制定,也才能真正促进与改善流动儿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辜美惜等(2010)《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现状述评》,《心理科学》,第4期。
2. 郭良春等(2005)《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少年城市适应性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9期。
3. 侯娟等(2009)《流动儿童家庭环境的特点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心理发展与教育》,第2期。
4. 李强(2004)《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钱文荣、张忠明(2006)《农民工在社会的融合度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7期。

6. 申继亮等(2007) :《流动儿童的家庭环境及其自尊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7. 申继亮、王兴华(2006) :《流动对儿童意味着什么——对一项心理学研究的再思考》,《教育探究》,第2期。
8. 史晓浩、王毅杰(2010)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的逻辑——指向一种质量互释的混合研究》,《南方人口》,第2期。
9. 王春光(200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10. 王桂新、王利民(2008) :《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综述》,《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11. 张文宏、雷开春(2008)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12. 郑晓康、李新宇(2006) :《流动人口子女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环境适应性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5期。
13. Colleen ,Ward ,Kennedy ,Antony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 Vol.23(4) ,659- 677.
14. Conzen ,Kathleen Neils ,Gerber ,David A. ,Morawska ,Ewa ,Pozzetta ,George E. ,Vecoli ,Rudolph J.(1992)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 :A Perspective From the U.S.A.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12(1) ,3- 41.
15. Gans ,Herbert J.(1974) ,Introduction ,Edited by Sandberg Neil C. *Ethnic Identity and Assimilation :The Polish Community.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Los Angel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6. Gans ,Herbert J.(1992) ,Second- Generation Declines .Scenarios for the Economic and Ethnic Futures of the Post- 1965 American Immigran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15(2) ,173- 192.
17. Glazer ,Nathan ,Moynihan ,Daniel P.(197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8. Greeley ,Andrew M.(1977) ,*The American Catholic :A Social Portra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 Portes ,Alejandro ,Zhou ,Min(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530(Interminority Affairs in the U.S. : Pluralism at the Crossroads) ,74- 96.
20. Sandberg ,Neil C.(1974) *Ethnic Identity and Assimilation :The Polish Community.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Los Angel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21. Warner ,William Lloyd ,Srole ,Leo(1945) ,*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2. Yancey ,William ,Ericksen ,Eugene P. ,Juliani ,Richard N.(1976) ,Emergent Ethnicity :A Review and a Reformu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1(3) ,391- 403.
23. Zhou ,Min(1997a)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1(4 ,Special Issue :Immigrant Adaptation and Native- Born Response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s(Winter ,1997) ,975- 1008.
24. Zhou ,Min(1997b) ,Growing Up American :The Challenge Confronting Immigrant Children and Children of Immigra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3(1) ,63- 95.

(责任编辑 朱 犁)

widened in our sample period. Moreover, our evidence shows that high wage rates in monopoly industries hardly improve the firm performance. This suggests that unreasonable higher wages exist. The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wage gap between the top executives and the employees is smaller in monopoly industries than the gap in the other industries, implying more equitarian income distribution within monopoly industries.

The Impacts of Catching-up Strategy and Factors Market Distortion on Chinese Employment :

A Study Based on Chinese Enterprises-level Data

Kang Zhiyong ·60·

Using the data of micro- dat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07,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local government's catching- up strategy and factors market distortion (FMD) on employment. We find that such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s caused the abnormal growth of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and biased technical progress, irrationally substituting capital for labor and eventually leading to a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with weaker ability of employment absorption. Meanwhile those effects are different among the firms with different size.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orrect their behaviors and alleviate distortion of factors market to make technology progress gradually be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 This will reduce substitution of technology progress for employment and eventually help employment growth.

Inter-generational Heritage of the Assimil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Zhou Hao ·70·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 generational heritage of the assimilation,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parent- child communication and some family backgrounds on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simil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PSDMC).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migrant children helps to develop the children's assimilation. Meanwhile school effect is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mily background. The assimil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has the properties of inheritance and plasticity. Inheritance affects more on the beginning level, and the parent- child communication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and slope. Therefore,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improve migrant children's family environment and adapt better parents' teaching approach.

A Study on Uneven Children's Education Resources Based on children's Education in China's 31 Provincial Areas

Wan Guowei ·82·

Equity of education resources has always been a core issue of children's welfare, therefore assessment on effectiveness of present education policy is necessary. Using cluster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technology of SPSS software to make a comparis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 in China's 31 provincial regions, the study find the decreasing trend from eastern areas to western provinces in children's education welfare, namely "better eastern vs. worse western". Meanwhile, current educational welfare policy fails to form a reversing effect. This article suggests priority to promoting China's education fiscal expenditure system, multiple welfare participation system and teacher resource guarantee system, in order to equalize education welfare supply among provinces.

Theory and Evidence of Female Graduates' Job Search :A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63 Universities

Zhang Kangsi Ying Shuai ·94·

Based on the job search theo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Logistic Multiple Sorting Model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the data of 63 universi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China, gender plays a negative role when female graduates hunt for jobs. The job searching hypothesis is not applicable to female graduates. Meanwhile, factors that affect job hunting are different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graduates. For the females, the factors such as opportunity, mastered skills, spirit of hardworking, working capacity, ideas and culture and ages play positive roles in job hunting, whereas for males, the factors such as leadership experienc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rnship experience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physical appearance play more significant roles.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equal working circumstance, improv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female graduates and enhance career services in colleges.

A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Land-less Rural Residents under Land Requisition

Qin Lijian Jiang Zhongyi ·102·

As China urbanizes, land requisition puts higher health risks over those land- less rural residents,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from 2003- 2007's large rural household survey. The health status of land- less farmers is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at of those being with land. It is mainly due to insufficient compensation for the requisitioned l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landless rural residents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amending current land requisition policies,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arning capacity of land- less farmers.